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5.04.001

儒家道义经济思想的价值意蕴和现代转化

钱国旗^a,朱乐景^b

鲁东大学 a.人文学院;b.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山东 烟台 264039

摘要:儒家道义经济思想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要义在于强调经济活动中道德伦理的优先性,主张义利统一,通过规范经济行为实现经济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儒家道义经济思想以民本观念为根基、义利关系为核心,形成了一套涵盖价值取向、经营伦理、交往原则、消费观念和分配主张的经济伦理体系,体现了儒家经济思想的鲜明特质。这一思想体系虽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相适应,但其中所蕴含的藏富于民、重义轻利、诚信互利、崇俭节用、均衡无贫等价值取向,对于在新的历史时期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要深入挖掘儒家道义经济思想的价值意蕴和实践智慧,推动儒家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转化为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思想文化动力。

关键词:儒家;道义经济;经济伦理;义利观

中图分类号:F09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5)04-0001-07

儒家道义经济思想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相适应的旨在调整利益关系、指导经济活动的伦理观念、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儒家道义经济思想蕴含着藏富于民、重义轻利、诚信互利、勤俭节制、均衡无贫等思想内涵,它们从根本上形塑了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价值观念,对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规范、限制、鼓励和指导意义,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国内学界对“道义经济”和儒家经济伦理多有关注。如郭剑雄将“道义经济”概念引入传统经济分析,揭示了中国传统经济发展中集体利益优先的伦理特质^[1];乔艳芳以山西票号为案例,分析了儒家道德伦理对经济主体的道德形塑作用,揭示了熟人社会网络中的信誉机制与经济实践的互动关系^[2]。在儒家经济伦理领域,唐凯麟等通过思想史梳理,探讨了儒家富民、均平、节俭等经济主张的德性主义特质^[3];张鸿翼在系统梳理儒家经济伦理的同时,也对儒家关于“经济关系的道德原则”进行了阐述,揭示了儒家对于经

济关系的道德规范作用^[4]⁸⁷⁻¹⁰⁵;邵龙宝则着重探讨了儒家信用体系与调均制度中的公正理念,为道义经济思想研究提供了制度伦理视角^[5]。本文在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儒家经典文献,提出并聚焦“儒家道义经济思想”这一核心概念,从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等多重视角出发,对儒家在经营、交往、消费、分配等经济活动中的具体道义主张及现代转化进行阐述,以进一步凸显儒家道义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的德性价值和伦理意义。

一、以民为本、藏富于民的价值取向

儒家把“人”看作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以民为本”“藏富于民”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影响下,历代王朝也多从厚生富民、轻徭薄赋的原则出发,制定各项经济政策和从事各项经济活动,可以说这一经济伦理思想对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认为,人在天地之中处于中心地位,天地

收稿日期:2025-01-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社团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儒家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23STA034)

作者简介:钱国旗(1966—),男,江苏太仓人,历史学博士,鲁东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会长;朱乐景(1998—),男,山东淄博人,历史学硕士,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科研助理。

万物莫贵于人。如《礼记》所云:“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6]698};“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6]1335}。孔子指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7]4},强调统治者要爱护和体恤人民。孟子则进一步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8]304}。他还指出,“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斯得民矣”^{[8]156},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荀子对人的重要性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9]194}他进一步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9]642}这形象地阐述了君民之间的依存关系,将民众看作是左右王朝命运的关键因素。西汉时期,董仲舒借用“君权神授”思想,提出了“伸天仁民”的民本理论。他指出:“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10]216}他认为,君主唯有以民为本、推行仁政,才能实现君民关系的统一与和谐,进而获得上天的垂怜与庇佑。宋代程颐有言,“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11]531},强调君主为政应以民众利益为根本。明末清初,黄宗羲推崇儒家“天下为公”的大道,指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12]14}。他进一步强调指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12]22-23},由此将百姓万民的忧乐看作是治理天下的根本目的。可见,以人为本是儒家一以贯之的思想观念。这些人本思想、民本主张应用到经济领域,进一步形成了厚生富民的经济伦理思想。

孔子在与其弟子冉有的讨论中表明了富民的主张:“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7]134-135}在孔子看来,富庶是基础,治理百姓要富而教之,民众富庶才能使国家富足。孔子重视百姓的物质利益,主张用“厚施薄敛”“博施济众”“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经济手段来恤养民众。孟子奉行“民贵君轻”的思想,他指出:“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8]16}荀子论证了民众的重要性以及富国与富民的关系。他说:“裕民则民富,民富

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9]209};“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窳仓廩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9]230}。因此,只有藏富于民才能使社会生产循环发展进而使社会财富不断积累。荀子还指出统治者不应以满足私欲与民争利,并提出了“从士以上皆羞利而不与民争业,乐分施而耻积藏”^{[9]593}的利民主张。孔孟荀以后,重民利的思想成为中华文化价值观念体系中的一条基本准则。在传统儒家那里,义利观总是与公私关系紧密相连。二程明确指出:“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则与众同利,无侵于人,人亦欲与之。若切于好利,弊于自私,求自益以损于人,则人亦与之力争,故莫肯益之,而有击夺之者也。”^{[11]917-918}在二程看来,利出于“公”则合“正理”,利出于“私”便会“损人”“力争”,他们看到了义与利、公与私、群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极力强调公利的正当性。

虽然历代儒家对于富民思想的具体主张不尽一致,但以民为本、藏富于民的价值取向则是儒家道义经济思想始终坚守的基本精神,这种取向也应成为新时代经济发展、国家富强和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3]因此,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把人民利益作为经济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切实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让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使发展成果更具全社会的普惠性,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让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群众^[14]。

二、重义轻利、以义取利的经营伦理

儒家以义利关系为核心,通过对两者关系的探讨衍生出一系列行为规范和经济主张,其主旨强调道义对于功利的优先性和至上性,即“重义轻利”“先义后利”。孔子主张把义放在首位,突出义的优先性,甚至把义利观作为君子与小人的道德评判标准。他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7]36};“君子喻于义,小人喻

于利”^{[7]38}；“君子义以为上”^{[7]188}。孟子将“义”看作是人的本质特征，把“义”作为“人之正路”及内心固有的道德原则。他指出：“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8]157}荀子也同样强调“义”的重要性，把重义作为衡量君子的标准。他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9]66}；“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9]68}。汉儒董仲舒认为，追求义和利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天性。他把两者的作用加以区分，指出，“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10]257}，说明义与利各有功用，同时也进一步突出了义先利后的主张。在此基础上，董仲舒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5]2524}的思想，这种“不谋其利”“不计其功”的思想存在着否定功利的倾向。宋代理学家尊奉“义以为上”的道义论，进一步强化了重义轻利的主张。程颐指出：“人皆知趋利而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也。”^{[11]176}朱熹强调：“凡事不可先有个利心，才说着利，必害于义。圣人做处，只向义边做。”^{[16]1218}

另一方面，在强调和推崇“义”的同时，儒家并没有否定“利”的合理性及必要性，而是强调“以义取利”，认为“义”与“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辅相成。“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7]148}是孔子非常认同的谋利准则，他反对用不义的手段去获取利益。他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7]35}，强调人们的逐利行为必须符合道德标准，必须用道义来指导和规范利益获取，做到“取之有道”。孟子也强调谋利要合乎道义。他说，“非其道，则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8]133}；“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8]207}。在孟子看来，不符合道义而获得财富，不论多少都应不屑一顾；符合道义而取得财富，无论多少都不算过分。荀子则进一步提出了“以义制利”的主张。他认为，寻求“欲利”是本性使然，不应被否定，但要做到以“好义”克制“欲利”。他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9]592}董仲

舒则继承了荀子“以义制利”的思想，认为，“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提防之，不能止也”^{[15]2503}，试图以道德教化提防约束人性，防止人们利欲熏心，冲破道德底线。宋代的王安石和陈亮提出了“义利交行”“义利兼重”的观点，认为义和利可以并行不悖。朱熹则发扬先秦儒家“取之有义”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义以生利”的主张，认为道义本来就包含着功利，只是不去计较。他指出：“罕言利者，盖凡做事只循这个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16]948}他还强调，“正其谊，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16]988}。

儒家一方面坚持“义”的价值导向，另一方面也肯定“利”的社会合理性，突出“重义轻利”“以义取利”的核心要义，强调在义与利发生矛盾时，要考虑利的获得是否符合义的要求，做到不唯利是图，不发不义之财。与此同时，儒家道义经济思想也有助于人们在义利之间找到平衡点，从而有助于树立以义制利、不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坚持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正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秉持的价值观念。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必须跳出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路径和唯利是图的功利主义思想，必须强调“义”的优先重要性以及“以义取利”的规范性，秉持重义兼利、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的价值观，时刻警惕功利主义的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避免人的商品化，防范发生金融危机。同时，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的价值观，还能够引导人们在追求最大物质利益的同时关注“义”的价值，使人们形成一种内在的道德自觉，自觉克制自身的功利思想，规范自身的谋利行为，进而塑造一种“见利思义”“义然后取”的谋利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此外，社会各经济主体也要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平衡好功能性与营利性的关系，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创造价值和利润，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共生共荣，把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的实践要求真正落到实处，坚持在高质量有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创造价值和利润，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三、诚实守信、诚信互利的交易原则

“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17]187}，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之一。儒家主张将经济活动双方之间的道德信任、道德

默契作为商品交换活动的基本道德要求,以此确定了经济交往关系中“信”的道德观念和信用制度。

“诚信”既是儒家道义经济思想的重要范畴之一,也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必要道德修养。《中庸》所谓“唯天下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18]134}的观点,强调个人讲求诚信才能知天命、立天下。孔子提倡做人要诚信无欺、言而有信,将“信”当作人的立身之本。《论语》有言,“与朋友交,言而有信”^{[7]5};“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轨,小车无轴,其何以行之哉?”^{[7]21};“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7]124};“言必信,行必果”^{[7]138}。孟子将诚信发展为“四端”之一,强调“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8]158},认为要诚信,首先就要“戒欺”,反对欺诈行为。荀子进一步论述了诚信的重要性,指出,“端悫诚信,拘公而详,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任”^{[9]33}。同时,荀子还以诚信为标准,对商人作了“良贾”和“贾盗”的划分。他说:“商贾敦惠无诈则商旅安,货财通,而国求给矣。”^{[9]271}相反,“贾盗”则是“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牟牟然唯利之见”^{[9]66}。可见,荀子对讲究信用的“良贾”给予了充分肯定,提倡商人在经济活动中要讲信用、守诚信。及至宋代,周敦颐进一步强调了“诚”的重要性,将其作为百业稳定发展的源泉,指出,“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19]15}。二程更是以“无妄”释“诚”,给“诚”赋予新的内涵,强调“无妄之谓诚,不欺其次矣”^{[11]92}。朱熹则在“无妄”之前还加上一个“真实”,“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人事之当然也”^{[20]31}。可见,他们都将诚信看作是人之为人的道德依据,是天之道、人之道。

综上,儒家先哲们把诚信作为人际交往的首要信条,提倡商人在商业活动中要诚信无欺、交往有信,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行为,主张建立一种道德为主、利益为辅的伦理型商业秩序。在新的经济发展环境下,这种诚信为本的交易原则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所倡导的“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的要求不谋而合,依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道德基石。立足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各行各业必须加强诚信文化建设,切实将诚实守信融入业务经营全流程,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和服务承诺,

用诚信文化固本培元和兴业发展^[21]。与此同时,儒家的诚信理念还讲求和注重道德的内在超越,以道德自觉约束和指导个体行为。只有大力弘扬和培育诚实守信的道德观念,传承和强化信用为先的交往理念,才能将诚信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信用根基。

总之,儒家提倡的讲信守诚、言而有信的交易伦理与经济发展以信誉为本的道德要求是一致的。在当前建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诚信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从儒家诚信理念中汲取丰富营养,全面挖掘其中蕴含的德性资源,将诚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质,坚持诚实守信、诚信为本的交易准则,发挥儒家道义经济思想在当代经济文化构建中的道德形塑作用,建立最融洽的经济交往关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四、崇俭黜奢、节用有制的消费观念

崇俭和节用是传统儒家在日常生活和经济消费领域的一贯主张。在小农经济生产困难和社会总财富供给不足的历史条件下,儒家先哲们强调从庶民百姓到皇帝百官各个社会等级的日常消费以及国家财政支出都应崇俭黜奢、节用有制,崇俭和节用成为全社会普遍倡导和认同的消费伦理要求。

孔子主张节俭消费,并给节俭的基本价值取向赋予了“礼”的意义,主张俭不违礼、富而好礼。他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7]24};他还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7]75}。孟子从恒产思想的理论出发,从治国的角度论述了崇尚节俭的益处,提倡统治者节俭有制,强调“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8]107}。他指出:“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8]162}荀子同样主张节俭,将节俭与国家安定发展相联系。他认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9]362-364}为此,他进一步提出了“节用裕民”的主张:“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有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9]209}。关于奢俭问题,汉儒董仲舒以“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学说为依据,论证了统治者讲求节俭的必要性以及君民的财富关系。他指出:“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过度失礼,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穷矣。

故曰木胜土。”^{[10]363}他认为,如果统治者奢侈失礼,将会导致民众叛乱、国君穷困。宋代儒士对节俭思想进行了新的阐释。北宋思想家李觏认为,节俭的标准会随着生产的发展、时代的不同以及境遇的变化而有所调整。他指出:“当其有余之时,用之可以盈礼;遇于不足之际,则宜深自菲薄。……俭非圣人之中制,有时而然,不得已也。”^{[22]139}这种节俭理念是对传统节俭思想的发展和适度合理消费主张的肯定,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王安石则从奢侈的弊端以及生产耗费的角度论述了崇俭节用的观点,并将节俭思想与社会风气和百姓贫富相联系,论证了节俭在保障百姓利益方面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君子制俗以俭,其弊为奢。奢而不制,弊将若之何?夫如是,则殫极财力僭渎拟伦以追时好者矣。且天地之生财也有时,人之为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费无穷。以有时之财,有限之力,以给无穷之费,若不为制,所谓积之涓涓而泄之浩浩,如何使斯民不贫而滥也!”^{[23]1204}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对崇俭抑奢思想进行了新的阐述,他指出:“今世俗大乱之主,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节俭者以为陋。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谤为务,此非慈亲孝子之心也。”^{[24]844}可见,不论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崇俭戒奢、节用有制的消费伦理思想一直都是被儒家宣扬和推崇的。

儒家确立了以崇俭和节用为核心的消费理念,探讨了崇俭黜奢、节用有制的消费伦理对经济社会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金融发展过程中,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纵欲主义与享乐主义泛起。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崇俭黜奢、节用有制的消费观念和厉行节俭、勤俭办事的行动原则,仍需大力提倡。崇俭节用的消费伦理可以使人正心养性,培育健全人格,提升个体道德修养,节制人的物质欲望,使人在声色犬马中不被物欲所役,以此避免和消解社会财富有限性与物质欲望无限性的矛盾激化,营造节制有度、和谐适度的经济消费环境,达到以“俭”促“勤”、以“俭”养“廉”的道德延伸效果。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适度消费是构建健康经济文化、推动经济市场稳定、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倡导适度消费可以避免过度消费和负债,保持财务稳健和理性消费习惯。因此,新时代提倡崇俭

节用的消费伦理应当与适度消费理念并行不悖,这样才符合当前我国“拉动消费,扩大内需”的基本国情。

五、均衡无贫、各得其分的分配主张

马克思指出:“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的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互相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25]999-1000}儒家所主张的分配思想正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所形成的,其分配观念并不是一种绝对主义的均平,而是一种各阶级、阶层各得其所的相对均衡,主张均衡无贫、各得其分。

孔子把分配方式的制定看作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主张民众的财富分配要与其社会地位相适应。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7]170}可以看出,孔子反对任意侵夺财富和扩大贫富差距,主张要适当兼顾各等级的利益,避免贫富差距过大进而激化社会矛盾。荀子继承了孔子的“均无贫”思想,在“分均则不偏”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制礼明分”的阶级差别分配理论。《荀子·王霸》提到:“然后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洽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9]261-262}董仲舒则把经济上的平均主张与政治统治联系起来思考,进一步提出了“调均”的分配观念。他指出:“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10]222-223}他主张富者、贫者要各安其分,使两者的财富比例保持各自的平衡,不要使富者太富、贫者太贫,还应通过合理均衡的调配把社会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否则,社会矛盾的激化势必引起社会动荡。宋代及以后,土地兼并严重,导致农民和封建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因此,理学家们主张在经济领域实行“均平”的分配原则来改

变这种现象。朱熹指出:“均则不患于贫而和,和则不患于寡而安,安则不相疑忌,而无倾覆之患。”^[20]¹⁷⁰王夫之针对土地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局面,进一步提出了“均天下”的理念:“是以一夫揭竿而天下响应,贪人败类聚敛以败国而国为之腐,蛊乃生焉。虽欲饵之,其将能乎?故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26]⁴⁷²。他认为只有遵循均物之理,使社会均衡无盈,才能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

由上可见,儒家分配思想的基本特点是既承认等级差别又反对两极分化的均平分配,“均衡”分配是其要旨所在,“调均”则是这种分配思想的实践方法^[27]。虽然儒家这种“均衡”的分配思想与现代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理念有所不同,但是其中所蕴含的“均贫富”和“调均”的思想方法对完善现代收入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合理的分配制度是保证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分配制度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资本财富在日常社会发展中的流向分布以及共同富裕目标能否最终实现。

需要注意的是,共同富裕不是简单的财富平均分配,而是要在全社会营造自强上进、劳动光荣的社会风气。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28]因此,我们在对经济发展成果进行分配时,要注重公平正义、均衡分配,充分发挥政府调控作用,既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又要有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以共同富裕目标和手段达到“均贫富”的社会要求。

儒家道义经济思想以民本观念为根基、义利关系为核心,形成了一套涵盖价值取向、经营伦理、交往原则、消费观念和分配主张的经济伦理体系,体现了儒家经济思想的鲜明特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有效的伦理支撑和道德引领。儒家道义经济思想作为儒学体现在经济活动中的伦理观念,总体上是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相适应的价值体系,但其中所蕴含的藏富于民、重义轻利、诚信互利、崇俭节用、均衡无贫等价值取向,对于在新的历史时期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构建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必须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我们要深入挖掘儒

家道义经济思想的价值意蕴和实践智慧,推动儒家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转化为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思想文化动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回溯儒家经济伦理的思想内涵,从传统中汲取历史经验和思想方法,对于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自觉与自信,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 [1]郭剑雄.传统经济即道义经济[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4).
- [2]乔艳芳.传统文化下的道义经济——以山西票号为例[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 [3]唐凯麟,陈科华.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4]张鸿翼.儒家经济伦理及其时代命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5]邵龙宝.儒家经济伦理及其公正理念研究[J].齐鲁学刊,2014(1).
- [6]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M]//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7]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8]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 [9]王先谦.荀子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
- [10]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
- [11]程颐,程颢.二程集[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
- [1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M].孙卫华,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21.
- [1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22(21).
- [14]度浔.以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护航金融高质量发展[N].光明日报,2024-01-31(2).
- [1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6]黎靖德.朱子语类[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7]左丘明.春秋左传集解[M].杜预,集解.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
- [18]大学·中庸[M].王国轩,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9]周敦颐.周敦颐集[M].陈克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

- [20]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1] 陈旭东,刘娜.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N].光明日报,2024-01-23(11).
- [22] 李觏.李觏集[M].王国轩,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
- [23] 王安石.王安石文集[M].刘成国,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21.
- [24] 顾炎武.日知录校注[M].陈垣,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
- [2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6]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3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1.
- [27] 韩涛.先秦两汉分配思想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5.
- [28] 习近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J].求是,2021(20).

Value Implication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an Moral Economy Thought

QIAN Guoqi^a, ZHU Lejing^b

a.School of Humanities; b.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Confucian moral economy thought, a cornerston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conomic philosophy,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core principle that prioritizes moral ethics in economic activities. It advocates the unity of justice and interests, and achievement of health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through regulating economic behavior. Rooted in the people-oriented concept and centered on th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stice and interests, Confucian moral economy thought constitutes a set of economic ethics system covering value orientation, management ethics, communication principles, consumption concepts and distribution propositions, reflecting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onfucian economy thought. Although this ideological system is compatible with the self-sufficient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it contain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enriching the people, valuing justice over interests, being honest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advocating thrift, and achieving equilibrium without deprivation, which is still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harmoniou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and ultimately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the peopl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t is impera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wisdom of Confucian moral economy thought, promo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culture, and transform it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driving force that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country and the great caus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 words: Confucianism; moral economy; economic ethics; concept of justice and interests

(责任编辑 雪 箫)